

试论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与局限

张朝晖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 400715)

摘要:20世纪50年代,鉴于苏联斯大林模式所带来的弊端,毛泽东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探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未将这些成果真正付诸于实践,相反,却重蹈了斯大林模式的覆辙,走上了一条与解放思想的初衷相背离的道路。研究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对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深入总结剖析这场可贵探索的重大理论成果与局限的基础上,力求能揭示出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斯大林模式;反思;局限

中图分类号:A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167-04

1956年,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崭新课题。当时,唯一可供我们借鉴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高度集中”、“高度集权”为特征,并具体反映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与体制上。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建设模式,固然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其弊端和负面作用也是十分严重的。

对此,一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已明显感觉到了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弊端。正在这时,苏共于1956年2月召开“二十大”,公开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这就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于是他提出了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走中国式”的道路,这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反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²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1957年2月,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以下简称《关系》和《正处》,凡引自此两文的不再注明出处)。在此前后,还围绕着相同主题发表了其他不少相关的谈话和文章^①。这些讲话和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反思斯大林模式,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归结起来,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针对斯大林模式垄断真理,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不允许自由讨论、批评,并肆意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因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2]⁵⁴⁰⁻⁵⁴¹显然,他把能否解放思想,看作是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解放思想?1956年4月,他亲自主持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为,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⁵⁰³⁻⁵⁰⁴。同时,还要确保言论和思想文化的自由。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方针的实质,就是承认社会主义言论、思想自由以及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创造性。因此“双百”方针,实际上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和保障。

第二,针对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领导和管理体制过度

^① 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历程,应当说终其一生,但笔者认为其代表性成果,集中体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故本文主要选择了这一时期为考察和论述的对象。

收稿日期:2009-06-30

作者简介:张朝晖(1963-),男,江苏南京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集权，未能兼顾各方利益，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问题，毛泽东提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在《关系》一文的开篇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此为指针，他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国实际，深刻阐述了迫切需要协调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关系的原则。首先，如何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就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同时，还提出了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加强国防就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既要有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原则。毛泽东还论述了政治领域的五大主要关系，其主旨仍在于阐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当说，这十大关系都是事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这些思想，不仅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反思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初步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后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针对斯大林无视、甚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种种矛盾，致使产生了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矛盾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后，于《正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两对矛盾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出过“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国的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认为这种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因此，应“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强调此点之目的不仅与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一致，而且也告诫人们一定要以苏联肃反扩大化和当时发生的波匈事

件为戒。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何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正处》中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一表述虽未使用“主要矛盾”的概念，但其实质与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一致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确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为改革的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四，针对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追求纯粹公有制和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轻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经济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要利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私营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是和生产力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来即使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不丰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3]。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其实和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439}。我国的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436-437}。在我国价值法则还起作用，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1]434}。价值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70}。可见，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深刻的、卓有远见的，已远远突破了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认识高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造和发展，并成为我们党后来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

第五，针对斯大林模式压制公民自由，践踏公民权利，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并实行极端个人集权和一党专制的错误，毛泽东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5]30}。为此，“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关于民主政治的目标，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关于民主政治的保障，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个人崇拜^{[2]304}。关于政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还认为有必要学习西方的某些民主形式。这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显然，这是他借鉴西方民主形式，打破共产党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一个尝试，意义深远。

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迈

开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步子，特别是《关系》、《正处》两篇文章可谓是毛泽东在当时反思与探索中的标志性成果，为纠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开辟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还是在制度创新上，毛泽东都未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和特征。主要表现出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彻底性与自相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主张，与实际中歧视、排斥知识分子及党外人士的反差；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开战为主要任务的主张，与实际中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反差；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主张，与混淆敌我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差；加强民主建设反对家长制和个人崇拜的主张，与实际中强化个人集权破坏民主制度的反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与实际中大搞“一言堂”、“一花独放”的反差；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主张，与实际中过分扩大剪刀差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反差；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主张，与实际中否认价值规律，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欲使资本主义绝种的反差等等。这些种种自相矛盾的冲突使得解放思想、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事业，从一开始便异常艰难坎坷，结果仍重蹈了斯大林模式的覆辙。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自相冲突和反差呢？这似乎是一个颇令人困惑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深入剖析事物的内在联系，便可以探寻到在复杂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的失误和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是最根本的主观原因；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强大的传统思维惯性、复杂险恶的国内外环境和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首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观方面的缺陷，使他的思想认识与斯大林模式有着内在的契合，因而无法根本摆脱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教条化的理解和受传统大同思想的束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带有较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且脱离现实条件，急于求成。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概论起来就是经济成份上求“纯”，利益关系上求“均”，政治上求“统”，发展速度上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这些特征与斯大林模式基本是相同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签署了《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认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一些普遍性的共同规律，即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级的联盟，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有计划地发展国

民经济^{[2]742}。这个文件是由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反映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主要原则的认识和理解，也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水平。正如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485}可见毛泽东把探索中国的建设道路理解为在坚持与斯大林模式相同“原则”前提下（所谓“原则”即基本的制度和体制），寻求不同于苏联的建设“方法”。结果，毛泽东在反思和探索中，虽然曾经形成过正确的判断，但终没能突破斯大林模式之框架，虽曾经迸发出宝贵的思想火花，却终因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冲突，反而被很快抛弃，从而陷入极“左”思潮的迷误中。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缺乏，风云突变的大环境，使理论创新本身带有很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从而造成毛泽东在实践中轻易放弃尚未经过长期考验的探索成果。1956年，当匆匆宣布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时，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豪迈地宣称“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是，由于缺乏经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并无足够的认识，他甚至认为，搞建设比打仗还容易。其办法就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2]817}。由此，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直到灾难降临，他才感慨“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5]141}。

5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环境进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多事之秋”。先是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共浪潮，接着发生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罢工、罢课、退社事件；1957年整风运动又产生了不少针对党和干部的较为激烈的批评意见；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又遭到了国际国内的纷纷质疑和批评。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和批评意见，有许多是毛泽东未预料到的。于是，肩负着社会主义事业最高领导责任的毛泽东，此时忧心如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进而提出了反修防修的考虑。既然缺乏可以倚恃的成熟有效的建设经验，而经过反思探索刚总结出的一些创新观点，其真理性又尚未得到实践的有力验证，甚至诸如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发展私有经济，扩大民主，集体领导，“双百”方针等，似乎与动荡激变的局势和反修防修的要求还显得格格不入，那么就只能采取自己得心应手的集权乃至残酷的对敌斗争手段了。尽管这些方式、手段可能恰恰是自己曾质疑过的苏联的经验和办法。这样，斯大林模式反而进一步被教条化了。

第三，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强大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成为将探索成果运用于实践中去的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毛泽东是经过长时期严酷环境锤炼与考验的革命家。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观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是

毛泽东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思维与行动的基本方式。革命战争的巨大胜利进一步促使毛泽东更牢固树立了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为核心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并且使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仍然简单套用了战争年代的这种模式,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结果,毛泽东强调要注重生产斗争,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但又认为只有抓好阶级斗争才能促进生产和调动积极性,因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304}。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却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7],从而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毛泽东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要学习科学技术和我们不懂的一切东西,但战争年代的经验又表明,群众的热情与干劲才是取得成功的法宝。于是,各种各样的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如影随形。

第四,不断强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导致斯大林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被突破的制度屏障。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集权领导体制,并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得以消减,相反还在最高领袖的要求和坚持下,有了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带有强烈个人集权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建国初,毛泽东便批评中央其他领导的所谓“擅权”,专门发文重申:“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6]这种体制下,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最终集中于领导者个人之手,组成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无限膨胀。一方面权力的集中程度不受约束,并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权力,不容许有来自其他任何力量的制约或挑战。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理论上毛泽东大力倡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实际中却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事实表明,毛泽东重犯斯大林的错误,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着力解决好体制的高度集权,反而努力地予以维护和强化。其结果,使得毛泽东的反思和探索活动,深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而难以自拔。从某种角度讲,此时的毛泽东,自身也成了体制的牺牲品。正如邓小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综上所述,在反思和探索中,毛泽东曾对社会主义建设具体方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观点,也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然而他又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标准认识教条化了,使得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夹杂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从而在总体和本质上仍肯定了斯大林模式。结果主观上他力图解放思想,以苏为鉴,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践中又相当程度地脱离实际,背离或抛弃了经过探索所取得的正确认识,承袭甚至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可见,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构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既是他反思中的根本局限,也是他探索中发生失误的深层原因。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我们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把握历史的真谛,避免悲剧的重演。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3]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7.
-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 [5] 许全民.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6,454-455,80.
- [7] 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00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Mao Zedong's Reflections on the Stalin Pattern and Limitations in Mao's Thoughts

ZHANG Zhao-h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50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abuses of the Stalin patter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o Zedong proposed the call to break down blind faith, to emancipate people's mind, and to explore the socialist road of China. He mad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his exploration,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heories about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However, unexpectedly, Mao Zedong did not put these theories into practice. Instea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in the Stalin pattern, he took the road contradictory to the principl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 study of this great historical tragedy will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o us when today we are continuing to emancipate our mind and take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eep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t theorie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over and reveal the major causes of his traged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Stalin pattern; reflection; limitations